



Aalborg Universitet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Schmidt, Johannes Dragsbæk

Published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Publication date:
2011

Document Version
Early version, also known as pre-print

[Link to publication from Aalborg University](#)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Schmidt, J. D. (2011). ——.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http://sspress.cass.cn/paper/22766.htm>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at vbn@aub.aau.dk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理论 Theory

亚洲地位上升或致世界多极新秩序——外交政策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

□约翰奈斯·施密特
(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

外交政策的批判政治经济学(CPE)主要研究国内、国际机构与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外交政策由具体机构制定,但是通常会受到体制的限制。外交政策的批判理论奉行的是整体主义,认为政策的制定不仅只涉及政府和国家,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信息的本构关系,质疑其是否服务于某特殊利益。

地缘经济学更能解释权力本质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外交政策研究优先考量的领域,批判政治经济学则提供了另外一个动态的视角。它认可民族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但同时认为,由于受资本积累的外部结构必要性的影响,国家调控模式存在基本共性。然而,主流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家多样性的区分最终会让它们忽视这些共性。

新现实主义和一些结构主义理论比如世界体系论,认为历史的变化遵循既定的路径,它与历史环境和人文机构无关,其结果就是以理论论证代替了历史的复杂性。批判政治经济学超越了正统的新现实主义,它把社会变化看做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进程以及新形态持续产生的过程,讨论现有的社会和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探讨惯例、价值观、机制和社会实践是如何出现并发生变化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不仅尝试从辩证法的角度解释历史的持续变化,而且研究探讨国家与世界秩序可能出现的其他形态。

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政治挂帅开始转向经济优先。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为军事实力不再是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首要因素,政治权威、安全问题与财富分配之间的经典互动已经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相反,经济因素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缘经济学呈现出比以往更显著的地位,这表明冷战后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相互关联拓展了传统的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由于对战略利益的追求,地缘经济学呈现出比以往更显著的地位,这表明冷战后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相互关联拓展了传统的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由于对战略利益的追求,地缘经济学呈现出比以往更显著的地位,这表明冷战后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相互关联拓展了传统的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

CPE 视国家形态为国家—社会复合体

批判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必要的先决构成实体,或者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中相互作用的国家利益的“黑匣子”;相反,它把国家形态看做是国家—社会的复合体,研究普遍存在的秩序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化。它研究各种社会力量以及联盟之间的消长、抗衡,包括研究不同阶层的利益整合如何决定国家利益以及如何体现历史结构的内在矛盾等,“我们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历史动态以及社会变迁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来考察国家的界限”。因此,有必要研究外交政策中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了解“是什么因素决定国家利益”以及“谁有能力改变它”。

比如,印度和中国冷战后力图提升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战略,事实上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联盟以及阶层的利益。地缘经济学主要研究在迅速变化的世界秩序下,中国、印度如何将其经济外交纳入到与其他国家以及地区的多重关系中去。一个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有产阶级是否能够为其全球扩张获得社会共识?如果不顾及在农村与城市地区的农民以及贫穷大众的利益的话,这种共识是否能够实现?印度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趋于主动,社会大众是否会认同?这些变化是否会导致对传统理念、价值观的背离?

亚洲经济繁荣导致全球力量东移

随着社会经济力量和治理水平的日趋复杂化,权力本身变得越来越分散,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权力被架空。即使它在某个既定疆域内依然拥有暴力的垄断权,但是其他诸多因素,包括金融资本,在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外交政策方面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由于跨国问题涵盖领域广泛,从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战到流行病,从能源安全、原料提供到多边经贸争端等,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再只是“国家”的决策,而且还



■约翰奈斯·施密特,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教授,长期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亚洲地区研究等。主要著作有:《南亚的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全球化与社会变化》(合编)、《东南亚的公民社会与分配矛盾》(论文)。

受其他行为体比如跨国集团、网络、媒体以及智库的影响。最终,“主权”层次模糊化,国家内部与外部的政治社会冲突导致“不干涉”制裁,这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如何得到。”

全球经济的巨大变化不仅促进了亚洲的经济繁荣,而且也导致了全球力量与影响的东移,具体表现为亚洲在世

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可能出现的多极新秩序。全球权力正在通过快速的经济发 展——我们当今世界的一个独特因素,来实现转移,而不是通过军事胜利或者地缘政治的重新组合来实现。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一个更全面和开放的“国家—社会复合体”的概念,这个复合体包括与其他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行为体比如个人、企业、军队以及民间团体的利益关系”。比如,跨

名词解释

批判政治经济学

按照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理解(1981年),批判政治经济学(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CPE)理论是将社会科学研究与历史发展特性相结合,对 社会现实与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它建立了一个更为全面和开放的国家—社会复合体的概念,这个复合体包括与其他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行为体比如个人、企业、军队以及民间团体的利益关系。

国能源需要通过贸易、征服、支配以及变更财产所有权等方式来获取,也就是说,市场不能从国际关系中单独剥离,独立于政府与军事之外。印度特别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北京采取的“把中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的战略或许就是允许中国主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出现少许“缝隙”。(作者单位: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冯黛梅/译)

方法论 Methodology

以议题为导向实现学科创新

□刘丰

如果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发生的四次大辩论为分界点,我们可以从库恩的科学革命意义上来理解国际关系学科的演进,大辩论的出现代表这一学科的反常和危机,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受到质疑和挑战,激发了新理论和 新方法的兴起,而辩论后形成的主导理论、方法或思潮则代表了国际关系学科进入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当然,从理论视角的多样性看,国际关系学科并不存在库恩意义上某一科学范式占据绝对主导的局面。

反思主义并未颠覆理性主义

目前,国际关系学科的第四次辩论已趋于平静。在这场辩论中,反思主义阵营对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起到了打破学科中的话语霸权、开拓新的研究议程的作用。然而,由于反思主义阵营或多或少地怀疑或者否定科学知识探求的可能性,批判已经积累起来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贡献,拒绝对知识的评价提出明确的标准,存在着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这样的态度对于学科

发展和知识增长而言是不利的。正因为反思主义阵营破而不立,无法提供替代性的知识体系,它们并未颠覆理性主义阵营的主导地位,反而向后者寻求妥协 and 折中。

由此看来,国际关系学科再次进入常规科学阶段,这一阶段有几个显著特点:其一,宏理论之争渐趋平静;其二,问题导向的研究成为主流;其三,不同理论尝试进行对话与综合。在常规科学阶段,重大理论创新和突破在新的孕育期,暂时还难以实现,而这一阶段正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可以与国际学术界实现接轨、对话与同步提供了机会。

国际关系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

在常规科学阶段,学术研究的主流既非理论导向,也非方法导向,而是议题导向。在主流学术期刊上,纯粹理论导向、方法论导向或政策导向的研究成果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大多数文章分布在各种不同研究主题下的具体议题中。例如,布鲁明(Marijke Breuning)等人调查了1995—2004年国际关系领域三本最顶尖的杂志——《国际组织》、《国际研究季刊》和《世界政治》,发现“纯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

平均比例只占6.7%,在这三种杂志的比例分别为9.0%、6.9%和2.7%。

这种状况实际反映了常规科学时期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学术共同体在一个或几个主导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普遍接受的工具和手段,对具体问题 进行探讨,形成知识的积累。而为了实现“解题”的目的,研究者一般需要做 到理论、方法和议题三者的平衡,即在一定理论视角指导下,以某种或几种科学方法为工具,试图解决某个议题领域的具体问题,从而得到经过实证检验的结论。

寻求理论、方法与议题三者平衡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或强调理论的评介、跟踪与梳理,或强调科学方法的推广、普及和运用。诚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是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两驾马车,但缺少了“议题”这架马车,学术研究就少了一个支点。因为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载体,是理论创造的来源,也是方法付诸实践的对象。正因为缺乏在具体问题上长期、持续和累积性的探讨,在经历几波理论引进的高潮之后,近来一些学者感受到目前理论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相对沉寂的状况。

造成这种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研究议题仍显狭窄,过于追踪潮流和时事,追求政策相关性,而对于许多国际学界讨论多年、积累丰厚的领域,中国学者尚未涉猎。以国际研究协会(ISA)和美国政治学会(APSA)为例,这两个跨国学术共同体分别下设24个和40多个分会,这些分会主要是围绕具体研究议题组成的学术网络和群体,不仅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对话与争鸣。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诸多议题鲜有涉足,许多研究者在研究议题选择上仍然处于“圈地”和“寻找空白”的阶段,没有讨论、争辩和批评,这种现象在传统和非传统国际关系分支领域都表现得很明显。

理论创新的难度要大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创新往往来源于利用既有理论和方法对重大议题的深入研究。理论和方法其实都是为了研究具体问题而服务的,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累积性的进步,就有必要强调以“议题为导向”的研究,寻求理论思考、方法运用与议题解决三者的平衡,增强解题能力,在众多议题上真正参与到与国际同行的对话中去,唯此才能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中国力量。(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

布告栏 Bulletin

首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征稿

2011年9月10—11日,首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研究生自主发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主办,欢迎各高校研究生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 1.论坛主题是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方法
- 2.请四所高校欲提交论文的同学在7月1日之前向本校组委会代表提交参会申请回执表和论文提纲,8月20日之前提交论文初稿,其他院校欲参会者请将论文直接提交至联系论坛秘书处。
- 3.所提交的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原创性,行文请参照《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字数以10000字左右为宜,不接收已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论文。
- 4.会议秘书处电子邮箱:guoguanluntan@yahoo.cn
- 5.详见: <http://www.saia.scc-nu.edu.cn/news/shownews.asp?NewsID=1252>

国关圈 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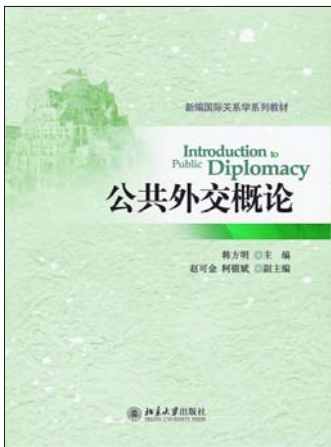
青年学者关注中国的周边安全与治理

本报讯 2011年6月4日,“中国周边安全与治理:理论、经验与问题”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这是该校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第五届青年学者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外交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央党校、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外经贸大学 and 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60余名青年学者及学生出席会议。

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周边战略的理论新思维”、“中国崛起与周边外交”、“周边地区热点与中国应对”、“周边治理与东亚地区合作”等四个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他们总结了中国周边安全与治理的理论新视角和地区合作制度路径,并以“中国崛起”为背景探讨了中国周边重要和紧迫的安全和治理问题。与会青年学者一致认为,本次论坛为国际关系学界的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开放的交流平台,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参与。

哲思 Reflection

一本专业教科书:开创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先河——评《公共外交概论》



■《公共外交概论》

□康荣平

2011年伊始,一位老友送来了即将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公共外交教科书——《公共外交概论》(韩方明主编)的样书。凭借多年的研究经历,我感到该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及时、适时地,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公共外交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和总结。公共外交究竟是什么、怎样准确定义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公共外交的升温而凸显。直到读了《公共外交概论》后,这些萦绕脑海已久的问题才一一得到解答。我相信,该书也定能为关注公共外交,但又未深谙公共外交的广大受众恰逢其时地“解渴”。

孕育公共外交理论产生的土壤,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对公共外交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层和各政府部门在其中发挥了首要的推动作用。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杨洁篪外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公共外交现在是在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2009年底,外交部将原来的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08年3月十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产生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将宣传和推广公共外交作为其重要职能之一。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学者和媒体等也投身到推动公共外交的事业中来,使公共外交在2010年受到中国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认同。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 一批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以公共外交为主题的研讨会相继在各地举办。其中,以成立于2009年、承办《公共外交季刊》的察哈尔学会为代表。察哈尔学会以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为己任,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高级研究员队伍,囊括了赵可金、王义桅、唐小松等多位优秀的公共外交研究者。《公共外交概论》的问世,填补了中国高等院校公共外交专业教科书的空白。从内容和结构上,该书结构清晰、内容丰富全面。通过原理篇、战略篇、管理篇三个篇章,全面、生动地论述和介绍了公共外交的理论和中外实践,使该书

不仅成为中国公共外交领域必备的 教学工具书,也可以作为当前中国公共外交领域的一本“百科全书”。从定位上看,《公共外交概论》在编写之初即被定义为基于新兴交叉学科——公共外交的专业理论教科书。因此,该书既可作为国内高等院校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新闻和传播学、公共关系等相关专业的专业理论教材,也可供相关科研人员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阅读参考,可能将是中国所有开设公共外交课程高等院校的首选教科书。同时,鉴于该书涵盖的公共外交专业知识和信息全面、广泛,从广义上说,该书也是更大受众——中国所有从事涉外工作和涉外管理人士——的工

具书、参考书。书中介绍的公共外交理论知识和信息,将为涉外工作人员带来莫大裨益。作为中国公共外交领域开创性的著作,《公共外交概论》不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跨国公司研究的读者,从本人角度来看,该书并没有考虑到公共外交新主体——跨国公司。在恭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著作问世的同时,也期望公共外交领域研究者能够更多地关注跨国公司这一新兴主体,以便更深入地探索跨国公司的本质,全面地阐述和发展公共外交理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